

邓氏家族的君子文化传承

陈何来

安庆邓氏家族以文名天下，文脉绵长繁盛。自一世祖邓君瑞在白麟坂落户，青山绿水间，耕作之余，训读子孙，代代相传。从邓稼先八世祖祖伯邓士涟“心存忠恕”践行孔子“忠恕之道”（即君子之道）开始，经过六世祖书法大家邓石如、五世祖书法家邓传密、曾祖父（著名幕僚）邓解、祖父教育家邓艺荪、二伯医学家邓仲纯、父亲美学家邓以蛰、四叔教育家邓季宣等人的传承弘扬，邓氏家族的君子文化，如静水流深，如修竹茂林。

邓士涟“心存忠恕”，践行“忠恕之道”

邓稼先八世祖士沅，祖伯父士涟都是清代庠生。清雍正十一年，安庆知府徐士林曾手书“心存忠恕”的匾额赠与邓士涟。“忠恕”一词来自《论语·里仁》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，把孔子修养君子之道概括为“忠恕之道”。曹魏何晏在《论语注疏》中解释：忠，谓尽中心也。恕，谓付己度物也。言夫子之道，唯以忠恕一理，以统天下万事之理，更无他法，故云而已矣。”南宋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解释：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”各个时期解释不一，但大体相通，简单地说：忠就是尽心尽力、尽职尽责，做好自己；恕就是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，善待他人（物）。“忠恕之道”是孔子推行仁道（泛爱众）的基本方法，是儒家修养君子人格、传承君子文化的基本遵循。邓士涟将这块“心存忠恕”匾额悬于厅堂，日日默念，存识于心，约束于行，传于子孙，邓氏家族的君子文化由此盛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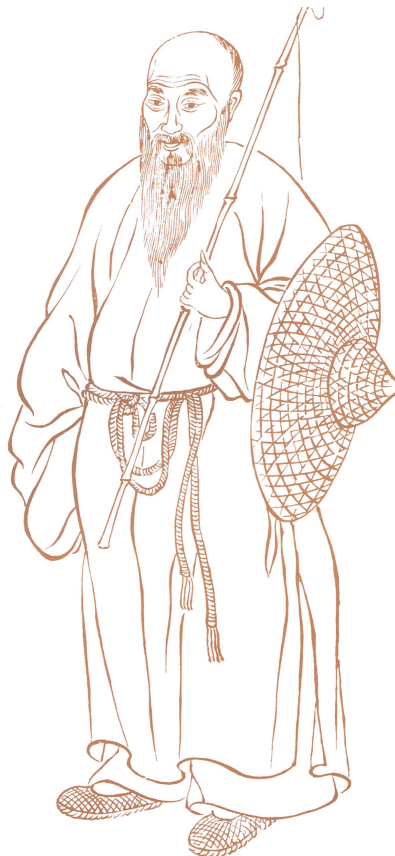
邓石如书法、篆刻中的君子文化

邓稼先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，清代碑学书家巨擘，书法作品以“苍古奇伟，雅健妙丽”著称，为学、处世皆行君子之道，人品、作品融汇贯通，饱含君子文化、彰显君子之风。

为寻得石刻精髓，坚持临摹石鼓文、李斯峰山碑、泰山刻石、汉开母石阙、敦煌太守碑、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、李阳冰城隍庙碑、三坟记等传世摹本，苦下其功，寒暑不辍。为博采众家之长，遍游各处名胜，寻访碑碣，搜求金石，物色贤豪，志在必得，死不旋踵，“终于产生了‘篆隶真行草’各体皆备、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。”湖广总督毕沅了解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，赠其铁砚一方，“先生常说携一砚可以云游四方，然而普通石砚不过一两年就被先生磨穿，今我赠先生铁砚一方，必能存世”。邓石如回到家乡怀宁后，将此砚藏于书房，取名“铁砚山房”，向子孙、族人昭示邓氏家族铁砚般坚定信念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。

邓石如一生篆刻印章无数，其内容富含君子文化，最为典型的如“胸有方心，身无媚骨”是《论语·雍也》“人之生也直（人靠正直立足于世）”演变而来，也是邓氏祖先“心存忠恕”的传承；“困学之子”是《论语·季氏》“困而学之”的转化，体现了作者谦虚、好学的精神；“休轻追七步，须重惜三余”是告诫自己或子孙不要好高骛远，要脚踏实地、分秒必争；“意与古会”就是把“慕古风、求古意”意蕴刻进顽石之中，以固化的形式传承君子文化；“家在四灵山水间”再现《论语·雍也》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”的意境，勉励自己寄情山水，修心养性，追求智仁境界。

邓石如篆书楹联“事比于则，文周于用，居保其望，出嗣其休”，意思是“处事要遵守法度规则，学问要处处致用，平时在家要保守名望，出门在外

山人小像
舊刻通國重摹
卷端以誌景仰
庚子

邓石如画像 资料图片

要继续展现美德”，这是典型的“君子四则”。邓石如木质隶书匾额“追养继孝”取自《礼记·祭统》“祭者，所以追养继孝也”，就是强调传承孝道。

邓石如隶书木刻“朱子家训”屏风，是将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刻于木板之上，做成屏风立于祖堂门前，以诫子孙，以示族人。屏风板材坚硬细腻，字体古朴稳健，笔锋平实流畅，训文字字玑珠、句句金声，其中“宜未雨而绸缪，毋临渴而掘井”与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”的意思相同；“勿营华屋，勿谋良田”符合《论语·学而》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要求；“居身务期质朴、教子应有义方”体现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君子义以为质”的立身原则；“凡事当留余地”就是做人、做事要把握好“度”，是“中庸之道”的一个向度；“家门和顺”是《论语·学而》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在家庭关系方面的具体遵循；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是告诫子孙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木刻“朱子家训”屏风，言近意远，深切昭明，是邓氏家族几百年来训读子孙、传承君子文化的金科玉律。

邓传密、邓艺荪、邓季宣等人的君子之道

邓稼先五世祖邓传密，清代书法家。幼承家学，篆书、隶书彰显家法；善写诗歌，以“温柔敦厚、文质彬彬”著称；深研孔孟经学，成一代大儒。曾任湖南石鼓书院山长，主张“至味五经中”，要求学生熟读四书五经，深得圣贤“至味”，领悟君子文化的要义和意蕴，蓄积“修己以安百姓”的内在精神力量。出生于怀宁的清代中兴名臣彭玉麟曾就读于石鼓书院，得邓传密真传，诗书超俗，武功盖世，“激昂慷慨，有烈士风”。邓传密晚年入曾国藩幕僚，以“忠恕”处事，成为曾国藩“可与共学”“可与适道”“可与立”“可与权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的良师益友。

邓稼先祖父邓艺荪，清末教育家。少时，随祖父邓传密（时任湖南石鼓书院山长）至湖南读书，得祖父悉心教诲，诗文书法皆清迥绝俗，深为长者称赏。邓艺荪历任芜湖安徽公学监督、安徽优级师范学堂斋务长（总务长）兼经学教员、安徽省教育司司长、安徽高等学堂校长等职，一生笃信儒家

传统，践行君子之道。西学东渐之时，欧风吹遍中国，他坚持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原则，坚持君子文化本体，兼容西学为用，博得世人尊敬。遗作《毛诗·尚书讲义》《离骚解》，意在解析、传播儒家文化精华。

邓稼先四叔邓季宣，现代教育家。自幼受家族君子文化影响，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，曾赴法国留学，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、光华大学、四川女子师范学院、安徽大学教授，安徽省督学、安徽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、宣城师范学校校长、安庆女子中学校长等职，教学中强调“民族精神、科学精神、法制精神”。曾因掩护进步学生、拒绝特务进入学校得罪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，遭到撤职。他宁愿卖字为生，决不屈从，有祖先“胸有方心、身无媚骨”之遗风。

邓以蛰的君子风范

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，延续祖先君子文脉，躬行君子，曾留学日本和美国，历任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厦门大学教授，一生追求“尽善尽美”的唯美境界，坚持“为民众的艺术”的文艺立场，著述累累，是现代著名美学家、美术史家、艺术理论家，与同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并称为“南宗北邓”。

邓以蛰倡导民众的艺术，出版文集《艺术家的难关》，提倡新文艺，反对艺术的功利性，强调艺术要同情人类的情感，鞭策人类的意志、引导人类积极向善。邓以蛰在书法上的研究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。他在《书法之欣赏》中提出，中国的书法不仅是美术，还是一种“性灵”的自由表现，更是传承文化的载体。邓以蛰撰写《画理探微》和《六法通论》，以“体一形一意”和“生动一神一气韵”的结构模式来描述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历程，其中“气韵”是最高境界，即人们常说的“意境美”，蕴含着传统文人的精神追求。

邓以蛰居身正大，家中悬挂“松风水月”四个大字，以此提醒自己与家人，为人当如松风高洁，似水月明净。由于亲身经历清朝腐败、军阀混战、列强欺凌的时代，邓以蛰一生最大的期望就是“中华民族的振兴，祖国的强盛”。艰难时期，有朋友投靠伪政府谋取食禄，被他破口大骂，深入骨髓的孔子名言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脱口而出。自己一家人安于清贫，靠开荒种地度日，如颜回般箪食瓢饮、安贫乐道。

邓以蛰“教子有义方”，要求子女熟读四书五经，深刻理解君子文化的深厚意蕴。一日，邓稼先正背诵《论语》，父亲朋友奇怪地问邓以蛰：“你这留洋回来，让孩子学英语还能理解，让他背什么《论语》呢？”父亲笑道：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作为中国人，怎能不懂得祖宗的东西？吃透自己的，学会外边的，才叫大学问！”曾制作“立不朽之德，立不朽之言，立不朽之功”匾额，嘱咐家人“这是我家的家训，希望以此为人生目标。”“三不朽”是古圣先贤超越生命的精神追求，是引导子孙后代的精神图标，是中华民族传承君子文化的最高形式。

邓以蛰深知“务民之义”的道理，国难当头、民不聊生，中国迫切需要先进科学技术强大自己、保护自己，“君子义以为上”，要主动担负起国家强盛、民族复兴的重任。1939年，邓稼先到昆明求学，邓以蛰对儿子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稼儿，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，科学对国家有用。”

邓稼先自幼受家族君子文化的熏陶，养成“温文尔雅、弘大刚毅、精益求精、无私奉献”的君子人格，为其成长为“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”打下坚实基础。

陈何来，怀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创作研究室主任，长期从事地方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、整理、点校，在国家、省、市等刊物发表历史文化类论文30多篇。

邓氏风骨